

蒙古历史文化文库

M E N G G U L I S H I W E N H U A W E N K 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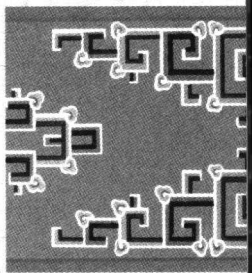
蒙古纪闻

汪国钧 著

玛希 徐世明 校注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蒙古历史文化文库



蒙古纪闻

汪国钧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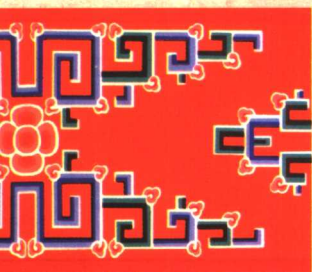
玛希 徐世明 校注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蒙古纪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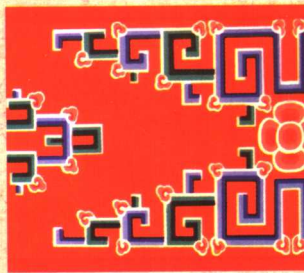
- 作 者 汪国钧
校 注 玛希 徐世明
责任编辑 王赤华
封面设计 徐敬东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呼和浩特市文苑印务中心
经 销 内蒙古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7.75
印 数 1-5 000 册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4-08537-X/K·493
定 价 18.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校注简介

玛希，曾用名玛希巴图、白瑞云，蒙古族，1925 年生于今赤峰市喀喇沁旗王爷府镇下瓦房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肄业。1946 年参加工作。曾任中共热河省委宣传干事、宣传科长、热河省抗美援朝、中苏友好协会秘书长、热河省人民广播电台代理台长、《昭乌达报》副总编、昭乌达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等职。1964 年调昭乌达盟地方志办公室任主编，1985 年离休。之后，仍参与地方史志工作至今。



校注简介

徐世明，曾用名孟克、闻实、施明等，蒙古族，1942年生于辽宁省建平县，1967年内蒙古大学政史系毕业。2003年退休前，任赤峰市政协常委、文史委主任。在任二十年，编辑、编著文史图书17辑(种)、500万字，主编《昭乌达风情》(汉文版)获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学术成果一等奖。1995年荣获全国政协“优秀文史工作者”奖。

出版说明

蒙古民族是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伟大民族。许多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与历史上蒙古民族的活动有着程度不同、性质各异的联系；今天，蒙古族分布在数个国家的大片土地上，那里大多是人口稀少，资源丰富，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地方。她的历史和现实状况引起了许多国家学术研究者对其历史、文化等的浓厚兴趣。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包括我国在内的 50 多个国家、地区开展了蒙古学研究，出现了一批专家学者及学术专著，并形成了几个国际蒙古学研究中心。蒙古学已经成为国际性的学术研究领域之一。

蒙古学研究无论是在我国历史文化研究中，还是在世界历史文化研究中，都占据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我国历史文化研究中的许多疑难问题有待于通过蒙古学的深入研究得以解决，世界历史文化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也同样如此。蒙古学研究的状况直接关系到我国人文科学研究的发展繁荣程度。一个时期以来，我国作为国际蒙古学研究中心之一，蒙古学研究获得了空前繁荣

发展,涌现出许多值得介绍给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优秀成果;而在俄罗斯、蒙古、日本、欧美等诸多国家蒙古学研究开展得比较活跃,出现了许多学术价值高、有见地、对作为国际蒙古学研究中心之一的中国的学术研究极具参考价值的论著。为了向我国学界和广大读者介绍这些研究成果,我们特编辑出版《蒙古历史文化文库》。期望本文库的出版能够进一步扩展我国学者的学术视野,并为他们的研究提供帮助。同时,也期望本书库的出版能够为广大读者提供更多值得一读的好书。

本文库重点推出国内外蒙古学学术著作,凡属蒙古学方面的通史、专史、研究专著、专题论集、文献研究和资料汇编等有较高学术水平又对国内学界有较大参考价值者,均在收辑之列,拟不定期陆续出版。

作为国际蒙古学研究中心之一的中国内蒙古,作为蒙古学研究出版中心之一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库不仅具有上述作用,同时传承与弘扬蒙古民族文化及文化遗产,也是国家和人民所赋予我们的责无旁贷的历史重任。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序 言

《蒙古纪闻》是清末民初喀喇沁右翼王旗汪国钧(卜彦毕勒格图)老先生的遗著,其主旨是从清末民初历史背景出发,向外部世界介绍水深火热中的蒙古社会,特别是介绍 1891 年发生在卓索图盟、昭乌达盟的“红帽子”惨剧和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改革图存之苦衷。所述史实皆属亲历,所记风土人情均系亲见亲闻,资料性、知识性、趣味性兼备。原稿于 1994 年,曾经由我和我的良师益友、汪先生的世交近邻玛希先生联手校注,以《校注蒙古纪闻》的书名,内部刊印为《赤峰市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原想是试试看的,不料反响不错,加上讷古单夫、乔吉等闻人学者多次在国际学术会议提到,索书的呼声又添不少,这便成了这次修改出版的理由。

《蒙古纪闻》书稿的存在历来鲜为人知。1985~1989 年,赤峰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简称文史委)与全市十二家旗县区政协,联合开展“红帽子事件调查和史料还家

活动”，即全面调查 1891 年发生在赤峰地区的红帽子流血事件，收集一切相关的文字资料和“三亲”资料，还历史本来面目，巩固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大好局面。1988 年春，有两个同志去沈阳搞“史料还家”，一个是当时任敖汉旗政协文史委办公室主任的齐成玉，一个是市政协文史委办公室的王襄平。辽宁省图书馆社会部研究员谈今先生与齐成玉有旧，他为赤峰市政协和面前两位年轻人的认真态度所感动，亲自指点尘封，便是我们手头这份《蒙古纪闻》的稿本。用当时的话说，这叫符合革命需要。

原稿由东京产 8 开对折 16 开型稿纸誊清。对折处用汉字数码标页；每页正反两面，各 13 竖栏，无横格；行文用所谓“喀喇沁体”钢笔字竖写，共 11 个大题，段落分明；有些大题下设 2 级、3 级小题，无标点；竖行一般 26~29 个字，共标明 96 页，约 65000 字。另有白纸封面，毛笔竖题“蒙古纪闻·喀喇沁汪国钧著”11 字。题字风格与正文一致。

《蒙古纪闻》原稿没设专门的目录。1994 年内部刊印时，根据编者的需要改变编排次序，始设“编目”；这次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恢复原作的编排次序，改为“目次”。为了说明“编目”与“目次”的区别，兹将 1994 年的“编目”节录如次：

- (一)喀喇沁王旗从前待遇蒙古之习惯；
- (二)喀喇沁王创办学堂之困苦及各方面之阻碍；
- (三)喀喇沁王旗练军与优伶之风潮；
- (四)喀喇沁王府之财政；

- (五)蒙古之虎围；
- (六)蟒古苏记；
- (七)喀喇沁王府伪神闾府之风潮；
- (八)蒙古口碑传说占知先兆；
- (九)鬼话“喀巴尔玛”；
- (十)光绪十七年红巾贼之变；
- (十一)喀喇沁旗剿灭拳匪纪略。

不难看出,1994年的“编目”,意在突出作品的资料性和趣味性;而本书前边的“目次”体现了原著及其著作人的时代本色。1918年的汪国钧是:红帽子大刀的身影仍在眼前挥舞,恐怖的“杀、杀、杀”声仍然不绝于耳,他急于告诉世人:救救蒙古人!所以原著把“光绪十七年红巾贼之变”这一篇,当作重中之重,放在开宗明义第一位,迫不及待、痛心疾首地告诉世人,光绪十七年的冬天,他的家乡喀喇沁等地发生了什么:冰天雪地里,一群穷苦农民,“短棉袄,破棉裤,不能伸手,而两肘怀抱刀枪,夹于腋间,依然低头喊杀而进”;“逃难蒙古,扶老携幼,悲涕哭号,目不忍睹。且此冬寒冷甲于往年也,又兼雪深尺余,冻死者僵卧路旁不知凡几;而少年孕妇生产道侧,不暇收拾,抛弃而去;其有未死者,尚呱呱不休……此天意乎?”在老哈河西山咀子地方,“全村所有蒙古二千余口,尽皆杀尽。有铡刀铡者,有牵到石槽砍之者,厥后数十石槽皆满人血。贼众每杀一人,抛在一旁,再燃高粱秸一束绑其尸上;而其妇女尤惨,既经奸淫,复于私处以刀割之;其幼孩则挑在枪头,令其挣扎为乐”……“蒙古二百年来实未

有之惨祸也。”《蒙古纪闻》就是如此尖锐地提出问题，解剖蒙古社会，指出改革前途的。写到最后，在第十一大题里，仍提醒人们红帽子仍有死灰复燃的问题。

红帽子事件后的第九年，即1900年，晚清朝廷企图利用义和团对抗洋人，义和团势力抬头。红帽子残余也想利用义和团的势力再起，喀喇沁右旗杜家窝铺的张连升，“聚众三百余人在金黄地设立公所……意图大举。”王府派管旗副章京海元等多人，“联合其附近开通之汉人”、本处团练，将其镇压下去——耐人寻味的是，汪国钧写到这里，并没有把话说透就笔锋一转，另提其他话题了。其实，张连升在这一次交锋中，又一次漏网。他家住的杜家窝铺与海元住的苏木桌村相邻，海元在喀喇沁王府办差，张连升因为是汉籍，只受平泉县管辖，不买海元的账。又过一段时间，海元终于将其捕获，没想到平泉县衙的消息果然灵通，很快派人来向海元要人。因为当时的规定是，蒙汉纠纷案件由县审理，所以海元等人只好交人。但是不巧张连升死于押解途中，衙役苦于无法交差，便捏控海元致死人命。海元深知有口难辩，情急之下逃往库伦，此公便是在外蒙古独立运动中举足轻重的海山（即海元），也有资料写作海珊。有人说，在《蒙古纪闻》里，“汪国钧的笔端似乎是倾注了对于正在消逝之物的爱惜之情”，我看这话说远了，建议读一读原著。

至于红帽子暴乱更详细的情况，我想应该通过《红帽子事件调查资料选编》之类专著去介绍，在这里需要说明的只是，不可以把它与人们通常所说的民族关系混为一

谈。红帽子事件是杨悦春之流想当皇帝的地主阶级野心家,利用金丹道等邪教组织,以土地问题(“杀人腾地”)为诱饵搞起来的残杀无辜恶作剧。在中国历史上,野心家们利用邪教搞暴乱的事比比皆是。有民族问题的地方,利用民族问题;没有民族问题的地方,利用其他问题;没有问题的地方,制造一些问题。这种邪恶从来都是不得人心的。以红帽子为例,他们东拼西凑十七八年,所能裹胁的不过百分之二。当他们凶相暴露的时候,被平(泉)、建(昌)、朝(阳)、赤(峰)百万汉蒙农民嗤之为“红头蛆造反”,共唾之、共诛之。

开列近代蒙古积弱积贫的事例,甚至不惜自嘲之讽,是《蒙古纪闻》的浓彩重笔。汪国钧当然不会忘记,蒙古民族的厄运是满清朝廷二百多年的处心积虑与蒙古社会某些积弊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蒙古纪闻》毕竟不同于历史教科书,所以,他不惜大量的笔墨去写掌故趣闻、俚俗奇谈,历数蒙古的无奈:耽于声色、自作威福的王爷;森严残酷的等级制度;气息奄奄的王府财政;愚腐误事的喇嘛教;动辄获咎的多神论……当然,也不乏对太平盛世的美好回忆(如虎围)以及对改革图强(贡王办学)的信心和忧虑,等等。其文,娓娓而谈,平心静气,貌似信笔捻来,实则深思熟虑,久成于胸而使然也。

汪国钧生逢末世,忧患多多,《蒙古纪闻》是他兴之所至,不是奉命之作(见“九、蒙古口碑传说占知先兆”篇末几句言语),足见他并不是一个宿命论者。恰恰相反,他始终是改革名家贡桑诺尔布的得意搭当,贡王的解放奴

婢、遣散“梨园子弟”、废除等级制度、限制喇嘛教、改革财政制度、兴学练兵、创办邮电警务、试验工商桑蚕等等超前跨阶般的改革，许多都能从《蒙古纪闻》中找到来龙去脉。确切地说，汪国钧的《蒙古纪闻》的历史价值，首先在于它代表了贡桑诺尔布这一代蒙古人变法革新的认识基础。

徐世明

2006年6月于呼和浩特

汪国钧及其《蒙古纪闻》

汪国钧，字翔斋，蒙古名卜彦毕勒格图，1853年（清咸丰三年）生于今赤峰市喀喇沁旗王爷府镇下瓦房村，1921年病逝，享年68岁。其父，蒙古名朝鲁，汉名汪良辅，在旺都特那木济勒任喀喇沁右旗札萨克时，担任梅林之职，掌管王府文案。

光绪十七年（1891年），直隶提督叶志超在平息金丹道及其善后活动中，袒护金丹道，称蒙古军平息叛乱中诬良为叛，妄杀无辜，奏折呈送军机处，礼亲王世铎询问事实真相，喀喇沁王命朝鲁条陈分析。说帖呈上，廷寄叶志超剿匪不严，偏护邪教。自是，叶志超对蒙古态度有所收敛。仇杀蒙古的暴乱稍觉肃清后，旺都特那木济勒再次晋京，由理藩院转奏暴乱情形及蒙民遭难无处栖身苦况，朝廷命庆亲王奕劻复询详情，又经梅林朝鲁拟文几千言，庆亲王据此回奏慈禧太后，奉旨由内务府拨银三万两，赈

济被难蒙众，发给川资，遣送回原籍，免除流离失所之苦。贡桑诺尔布继任札萨克后，委朝鲁为管旗副章京。再后，又兼任崇正学堂监督，办学卓有成效，桃李满天下。

(一)

汪国钧幼年受过良好教育。其父为他延请家庭教习，学习蒙、汉、满三种文字。成年后娶本村朱姓之女为妻。他的家庭称得上书香门第。在下瓦房村，汪、金、朱三个蒙古姓氏中，又以汪姓族人为最多，除下瓦房村以外，还遍布大营子、小牛群、西桥、宁城、建平等地。他的住宅，其先人草创之初，较为简陋，房屋周围以柴栅代院墙，俗称杖子院；后来经过扩建，建成四进院落，门前有影壁、树林，后院是果园。由于酷爱读书，购置图书极多，所藏书籍满贮三间瓦舍，在邻里中无与伦比，可惜土地改革中荡然无存。

他的先祖，从他的遗著《蒙古纪闻》中得知，本为山东登州府汶县人，数百年前迁居塞外，久居大宁城西二里许，明季划入朵颜卫，后为乌梁海（史称兀良哈）所属。迨至明季末叶，遂为喀喇沁之向导，成为清兵之翻译，屡立战功，归喀喇沁右旗蒙古籍，故虽汉姓，而其资格却在一般蒙古人之上。有清一代，汪姓一家，七世为管旗章京。康熙年间，跟随旗札萨克由大宁附近辗转迁徙到锡伯河川。乾隆初，在下瓦房落户，与清末冈子杨鼎臣家为邻，同后起的金永昌相距很近。

(二)

光绪十七年(1891年)教汉金丹道起事,大肆屠杀蒙古人,喀喇沁右旗札萨克收容教汉等地逃难蒙古,组织队伍,到楼子店以西的上烧锅进行阻击。汪国钧以笔切齐的身份参加了这次战役,在他一生中留下深刻的印记。后经数十年的思考和研究,对当年的事件从六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其中既有对蒙汉两族经济利益冲突的分析,也有对教汉当权者作威作福行为的谴责,当然也有对中国农民愚昧狭隘的痛惜。虽然不能说《蒙古纪闻》对金丹道事件的分析是尽善尽美的,但在他来说实在难能可贵了。此外,《蒙古纪闻》以严肃的态度,犀利的笔触,记录了原昭乌达、卓索图地区的风土人情,无疑对保留地区史料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比如,在蒙古虎围的记叙里,使后人知道了喀喇沁右旗王府从公爷府迁到新址的原因,那是便于更好地供职于乾隆皇帝的游猎,即木兰秋狝。虎围的组织形式,借鉴了清朝皇帝猎虎的方法,然而也保留了蒙古、契丹族的习俗。这篇文章写得眉目清楚,生动活泼,有声有色,给人以丰富的历史知识。在王府优伶与练军士兵风潮的记述里,透露了蒙古王公已从崇尚武备转向享乐腐化一途,致使士兵见到王爷厚此薄彼,引起强烈不满,虽然伤害了王爷的尊严,却也无可奈何,只能不了了之,等等。

(三)

《蒙古纪闻》对许多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记述是公允的，实事求是的。人们传说，旺都特那木济勒生前性格残暴，在《蒙古纪闻》里，这一说法得到证实。这个人物对一些问题的处理有不近人情的一面，同时另一方面却又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的诗作很多，遗留下来的绘画颇具功力，而且教子成名。

伪神闾府风潮中，由于封建统治者对喇嘛的崇信，致使一些喇嘛竟企图兴风作浪，甚至想杀害一个旗的王位继承人，由他人取而代之。事情败露之后，受到惩罚，便免死狐悲，庙中喇嘛又以罢经相威胁，嚣张的气焰达到顶点，反映了在当时蒙古社会中神权的猖獗。

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差役繁重，作品中以同情受压迫者的心情揭露了下层男女差役所受的折磨。对幼小儿童的折磨尤其严重，甚至对大小便也加限制。处罚的方法刻薄到极点，有时甚至就是作弄取乐。所有这些，都使《蒙古纪闻》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

汪国钧在旺都特那木济勒当权时期，明显地受压抑，因而对府中的制度不满。贡桑诺尔布担任札萨克后，他的才能日渐得到发挥，先是担任洋行的副经理，继而在毓正女学堂和崇正学堂任教，把陆君略编写的《喀喇沁源流要略便蒙》译成蒙文。在教授崇正学堂蒙文时，撰写了